

河东三篋：文脉传承的生动注解

□记者 王捷

当年，汉武帝巡视汾河时，留下了千古绝唱《秋风辞》，“秋风起兮白云飞，草木黄落兮雁南归”的经典诗句，如今依然回荡在秋风楼上空，定格下了历史的厚重与积淀。而在经过河东时，还留下了一段故事，虽鲜少有人所知，但却让我们看到了知识传承与文化守护的动人笔墨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成语典故“河东三篋(qi è)”。

篋，意为书篋，是用来放置图书典籍的小箱子。成语河东三篋，本义指汉武帝视察河东时曾丢失三箱典籍，后来引申为亡失的书籍，后人多以此典形容人读书广博，记忆力超强。这一典故，来自东汉班固的《汉书·张安世传》，讲述了一个关于书籍“失而复得”的故事。

在《汉书·张安世传》中，有一段记载：“上行幸河东，尝亡书三篋，诏问莫能知，唯安世识之，具作其事。后购求得书，以相校无所遗失。”这句话是说，汉武帝在巡幸河东（今运城）时，遗失了三箱典籍，下诏询问但群臣无人知晓，只有张安世记住了书中的内容，并把其详细写了下来，后来悬赏征求找到了那些书，校对后发现没有什么遗漏的。

张安世是御史大夫张汤之子，武帝时任光禄大夫，昭帝时任右将军，宣帝时为大司马。出生于官宦之家的他，年纪很轻就因父亲的缘故荫补为官。他做事认真，连放假公休都不外出。也因为能完全复述出那三箱典籍，张安世受到汉武帝的赏识，被破格提拔为尚书令，后又调任为光禄大夫。汉武帝对张安世的重用，不仅体现了其在用人方面的思维，也让人们看到张安世本身的才学。

与身为酷吏的父亲相比，张安世并没有抱怨父亲，而是凭借低调谨慎、宽厚勤勉、清正廉洁等品质成为一名好官，更得到班固“满而不溢”的高度评价。他们父子二人的结局也天差地别，张汤最后被政敌构陷，自杀身亡。而张安世最后跻身“麒麟阁十一功臣”之列。

如今再回过头来看，能凭记忆写出三箱遗失的典籍，这背后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，不禁令人叹服。在张安世所处的时代，书本都是刻写的竹简，因为笨重，传播不易，保存更是不易。而张安世能将这三箱典籍全部复述出来，既让后人看到了他的博闻强记，也看到了他对文献传承的重视。没有现代技术存储方式的加持，人的脑力与记忆，成为文化遗产的载体，才让珍贵的知识没有遗失。

慢慢地，后世用“河东三篋”来称赞学者的才学，形容人藏书丰厚、学识深厚，让这一成语从历史符号，转化为文化语境中对“学识储备”的赞美。这个典故也常见于古籍整理、文献辑佚等语境，如清代宋荤在整理《唐百家诗选》时撰序提及“宝爱之者，比于古光片羽，莫不思复得河东三篋”，以此强调稀有文献的复原价值，既用于客观描述古籍散佚，又暗含着古人对典籍复原的期待。

老话常说：“千年的文字会说话。”无疑，这份藏于竹篋中的智慧，仍对当下重视文化传承与积累，有着重要现实意义。据有关记载，汉武帝曾8次巡幸河东，站在他的角度，能随身携带多种重要典籍，并对张安世重用，足见其对文脉传承的重视与尊崇。汉武帝的雄才韬略、选贤任能，张安世的博闻强记、守典护文，让这份珍贵的文脉传承在岁月长河中愈发可贵。

而纵观河东历史，无论是西汉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，还是北宋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，抑或是清代李毓秀的《三字经》……从历史上的竹简传抄，到纸墨流芳，再到现在的电子书籍、有声书籍等，文化传承的形式在变，但河东三篋



▲秋风楼 记者 薛丽娟 摄

所蕴含的文脉传承内核却从未改变。开卷有益并不是一句空话，也许，就是在手捧一本书的一开一合中，这份河东三篋的精神，就印刻在我们脑海中，中华文明的火种、中华文化的根脉，就这样不断传承。

□牛智贤



坐拥书城

在乡土叙事中抵达永恒

——从《南风薰兮》看李立欣的散文观

要组成部分。他考证“咸韭菜”称作“han韭菜”的古音渊源，指出“晋南是华夏文化的滥觞之地，民间有许多古音与方言”。这是对语言现象的记录，更是通过“语言寻根”重建乡土文化自信。将“割麦”称为“po麦”，“池塘”叫作“池泊”，这些方言词汇既是地域标识，更呈现乡民思维与世界观，强化了文本的在地性与真实性。

二、日常美学的深度开掘：微观史与平民史诗

他拒绝宏大空洞叙事，转而采用平视视角聚焦日常，在微观历史与平民生活中挖掘史诗性。

选材的平民视角与微观史价值。他的笔触始终对准普通人：舅厦奶、老姑、洋马汉子、卖兔头的夫妇……通过小人物命运折射大时代变迁。《舅厦奶》中对老人晚年与临终时刻的刻画，不仅是个人情感的抒发，更反映了农村养老、城乡流动等社会现实。《与免记》中，叙写20年前人与兔的命运交织，记录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无奈与苍凉。这种“微观史”书写，让散文具备为时代“立此存照”的文学见证价值。

“美与善的双翼”：写作的伦理维度。作家张石山评价《南风薰兮》，“美与善是提领写作和阅读升华的双翼”。“美”体现为对生活细节的诗意捕捉，譬如，形容蒜香味“像贼一样见缝就钻”，辣椒炒葱如“明月配清风”。“善”则体现为对笔下人物深切的同情与理解。他拒绝居高临下的评判，始终以平视的角度呈现生活的复杂性与真实性。这种写作伦理，使其散文既充满烟火气，又饱含人文关怀，实现了审美与伦理价值的统一。

乡愁的深化：从个人情感到文化反

思。他的乡愁意识超越简单怀旧，是对逝去亲人的刻骨追忆，对地域人群性格（如万荣人的“zeng气”、新绛人的“和气”）的深刻洞察，更是对正在消逝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传统的怅惘记录。这份乡愁，关联着具体的生命体验，最终升华为对现代化进程中精神根脉何处去的哲学叩问，从而使个人情感获得了普遍意义。

三、语言风格的自觉追求：土性与诗性的融合

李立欣在语言上有着高度的自觉，形成了一种“接地气而不失典雅”的独特文风，是其散文观在形式上的核心体现。乡土词汇的文学化提炼。他大量使用晋南方言，却通过文学化处理，避免了生硬。用“见缝就钻”形容春风，把韭菜嫩叶比作“明茶”“簪头”，使土白的口语与诗意的比喻自然交融；化用古典诗节奏，如“南风生潞盐，黄土有韭菜”，赋予乡土语言庄重凝练的气质。

细节描写的感官化与拟人化。他善于调动读者的多重感官，营造强烈的代入感。写洋槐花，兼具视觉、嗅觉、味觉；写熬菜，用拟声词“文火‘咕嘟’一阵子”，画面感与生活气息扑面而来。将砂锅拟人化为“朴实得像位村里大叔”，将孤山形容为“有男人的样儿，有女人的范儿”，使物象充满灵性，成为乡土精神的化身。

叙事节奏的从容与情感抒发的节制。他的叙事娓娓道来，《老姑》中从家庭琐事引入人物刻画，抒发强烈情感时，始终保持克制，以冷静的笔调渲染。《舅厦奶》结尾，“我泪如以往，驻足望明月，明月依旧；泪眼问星河，星光隐约……”以景结情，含蓄蕴藉，尽显传统美学的韵味，让情感更具绵长张力。

四、家国情怀的升华路径：由乡及国的宏大关怀

李立欣散文观的最终落脚点，是深沉的家国情怀。这种情怀是通过实实在在的乡土叙事自然升华而来的。

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的同构。他笔下个体的生命轨迹，总与国家的宏观历史紧密交织。《垣曲人》中，通过伯父作为工人的家庭记忆，描绘了垣曲因矿产开采、铁路修建从“山野桃源”融入现代工业文明的图景。个人“小历史”由此被巧妙地纳入国家发展的“大历史”叙事中，使家国情怀有了坚实可感的现实基础。

地域文化自信与文明传承自觉。他对万荣精神、新绛工匠精神的描写，背后是强烈的文化自信与传承自觉。书写绛州澄泥砚、“绛帖”等文化瑰宝，这种对地方性知识的尊重与发掘，本质是对中华文明多样性与生命力的礼赞。

“乡土中国”现代化进程的文学见证。通观《南风薰兮》，可清晰看到“乡土中国”在现代化浪潮中的变迁：亲族伦理变化、经济模式更迭、城乡关系演变。李立欣的写作具有文学见证的价值，为变化中的乡土社会留下一份充满体温与深情的文学档案，其意义超越文学本身。

一言以蔽之，李立欣的散文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：以晋南乡土为根基，借风物、民俗、方言的多维建构，确立书写的文化坐标；以日常美学为路径，通过对微观史与平民史诗的深度开掘，确立平视、真诚的写作伦理；以土性与诗性融合的语言为翅膀，形成独特文学魅力；最终，通过由乡及国的叙事，将个人乡愁转化为对文化传承与家国命运的关怀，实现“在乡土与烟火中寻找永恒”的理想。

其创作实践，为当代散文处理个人与时代、乡土与家国、审美与伦理的关系提供了启示。他的写作是文化抢救式的努力，更是精神上的寻根。透过《南风薰兮》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作家对故土的深情回望，更是时代巨变中借文学安顿个体心灵、凝聚文化认同的积极尝试。